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

陈开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

陈开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 / 陈开科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第三辑)

ISBN 978 - 7 - 80678 - 859 - 2

I. 巴... II. 陈... III. 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后期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012 号

责任编辑 郑力民

封面设计 杨捷

技术编辑 吴放 丁多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

陈开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 × 965mm 1/16 印张 35.5 字数 510,000

2008 年 6 月第一版 200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 - 7 - 80678 - 859 - 2/D · 16

定价: 75.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中俄友好年”



图版1:第十二届俄罗斯馆修士辅祭,第十三、十五届俄罗斯馆修士大司祭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巴拉第),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Палладия)
(1817~1878)

序

蔡鸿生

有清一代,中俄关系是一对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朝野所共识。按清朝“夷务”体制,俄罗斯为北地陆路通商之国,类乎“朝贡藩属”,因而比西方海运国家较受礼遇,享有在北京设馆驻使的优先权。体现这个优先权的,就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俄罗斯馆)。它集商务、外交和文化功能于一身,虽无使馆之名,而有使馆之实,在历史上产生过一种绝不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

俄罗斯馆史作为俄罗斯对华关系特定时期的缩影,是非常值得回顾的。陈开科博士的专著,以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为研究对象,堪称缩影中的缩影,微而显,窄而深,大有裨于知人论世。巴拉第从修士辅祭到修士大司祭的升迁,与道、咸、同、光四朝的中俄关系连成一体。面对清朝的边疆危机和统治危机,他随时随地都是唯沙皇政府马首是瞻,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巴拉第毕竟非同凡响,“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作为一名有教养的“达喇嘛”,他以北京俄罗斯馆为基地,辛勤而又持久地研究儒、释、道的经典和满、蒙、藏的文化,卓有建树,终于成为介乎俾丘林与王西里之间的一代宗师,获得国际性的学术声誉。开科博士负笈莫斯科多年,拥有双语优势。他的专著,根据丰富的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实事求是地为巴拉第写真,展示其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的时代特征,对其矛盾性的历史地位作出同情的理解,体现了“实事求是”与“知人论世”的统一。这种理性化的历史思维,学识兼备,史论结合,绝非灵机一动所能达到。

在著述的体例方面,本书也有所创新。附录的《巴拉第年谱简

编》，简明扼要，勾画出谱主 61 年的生命历程。清代学者章学诚说过：“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本书为洋人撰谱，旨在知人知言，是继裘克安先生《莎士比亚年谱》之后的又一次尝试，值得称道。

在近代的世界汉学史上，西洋汉学、东洋汉学和俄罗斯汉学，本来是鼎足而三的。后者那种摒弃烦琐、经世致用的倾向，尤其独具一格，引人瞩目。可惜，限于语言和资料，俄罗斯汉学在我国学人心目中，长期疏离，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巴拉第本人，除偶尔在陈垣先生著作中以“驻华东正教会拍莱狄斯主教”之名被提及外，几乎默默无闻，实为一大憾事。开科博士这部专著，以小见大，既评价了巴拉第的生平和学术，又揭示了俄罗斯汉学的起源、特色和发展道路，有助于拓展人们的历史眼界，进补填空，难能可贵，岂止是为书林增添异彩而已哉。

中俄关系史曾经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显学之一。进入新的世纪，前景更加广阔。随着学术新秀的涌入，这个研究领域必将人才辈出，不断呈现新的辉煌。

2006 年冬

序于中山大学蒲园寓所

目 录

前言:巴拉第的生活与学术活动概述	1
第一节 神学世家的少爷:巴拉第的早年生活	2
第二节 三十年京华砥砺:巴拉第在北京的生活和学术活动概 述	8
第三节 身后文章合有名:后人对巴拉第在华活动的评价及局 限性分析	27
 第一章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文化关系	70
第一节 但开风气:巴拉第的蒙古史研究	72
一 巴拉第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	72
二 巴拉第译注《元朝秘史》	88
三 巴拉第译注《圣武亲征录》	117
第二节 科学与政治:巴拉第“科学考察”南乌苏里边区	130
第三节 心有灵犀:巴拉第对中国宗教历史、文献的研究与翻译	150
一 俄罗斯馆的一道风景:巴拉第对中国佛教历史与文献 的研究、翻译	152
二 首倡近代化研究:巴拉第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献的 研究	170
三 “中国中心的范式”: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187
第四节 功不可灭:巴拉第首倡编辑《著作集》	223

第五节 绝笔之作:巴拉第主编《汉俄合璧韵编》	250
第二章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贸易关系	274
第一节 不解之缘:北京俄罗斯馆与商队	274
第二节 商务间谍:北京俄罗斯馆注意中国经济活动的传统	283
一 沙俄政府对北京俄罗斯馆的整顿和改革	286
二 1850 年前北京俄罗斯馆以情报收集为手段干预中俄 贸易的情况	297
第三节 情报高手:巴拉第与中俄贸易	307
一 巴拉第对中国商路的考察与研究	307
二 巴拉第极力收集中国茶叶贸易的情报	323
第三章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外交关系	348
第一节 并非使节的使节:北京俄罗斯馆的外交职能	349
一 沙俄政府给北京俄罗斯馆的外交指令	349
二 北京俄罗斯馆成员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354
第二节 镇压与利用:巴拉第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对华外交	361
第三节 京津道上的神秘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巴拉第	385
一 巴拉第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密切交往	388
二 巴拉第与普提雅廷的“调停”	407
三 巴拉第与耆英的交往	462
Abstract	493
附录 巴拉第年谱简编	499
参考文献	522
一 俄、英文文献	522
1. 档案	522
2. 手稿	522

3. 杂志	523
4. 巴拉第著作	524
5. 俄罗斯馆成员及教会学者著作	525
6. 俄、英文间接参考资料	528
二、中文文献.....	540
1. 档案、史料集	540
2. 古籍	542
3. 一般著述	543
后记	555

前 言

巴拉第的生活与学术活动概述

П. И. 卡法罗夫(1817 ~ 1878, Кафаро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教名巴拉第^[1](В монашестве Палладий), 于1817年出身于俄罗斯喀山州一个神学世家, 后又毕业于当地一所宗教学校。按一般规律, 他必定会成为成千上万神父中的一位, 默默无闻。可是, 在他22岁也就是1839年, 他突发奇想, 自愿申请参加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俄罗斯馆, 即清人所称“俄罗斯馆”(以下均用此称)。这一举动, 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先后三次到达北京, 居住时间达30年^[2]。他和遥远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为世界公认的著名汉学家。当代俄罗斯汉学家霍赫洛夫(Хохлов А. Н.)评论:“他是俄罗斯汉学科学大师之一, 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中亚及远东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在东方学领域里, 他的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 科学兴趣表现得非常广泛, 无论是在俄罗斯, 还是在外国,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权威, 因

[1] 根据辛华等编《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344页), “Палладий”译音应该为“帕拉季”。可是, 早年出版的一些经典性著作,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著作《沙俄侵华史》, 还有蔡鸿生教授的《俄罗斯馆纪事》等, 都将此译成“巴拉第”, 拙著为写作之便, 一从旧译。

[2] 斯卡奇科夫认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了33年(См. Скачков П. Е.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 1977г. С. 151); А. 列舍托夫也持这种观点(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М. 1997г. С. 289); 俄罗斯科学院研究俄罗斯馆史的专家 А. 伊芭多娃认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时间为30年左右(С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275 - 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Пб. 1993г. С. 112.), 这比较符合实际。如果以到达和离开北京的时间为准, 巴拉第在北京的居住时间应该是30年。

此,在他那个时代,他被公认为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1〕而现代俄罗斯汉学界,则习惯将他和比丘林(Бичурин Я., 1777 ~ 1853)、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В. П., 1818 ~ 1900)并称为“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2〕。下面,我们简单描画一下这位杰出汉学家一生的生活和学术活动的轨迹。

第一节 神学世家的少爷:巴拉第早年的生活

有关巴拉第早年的情况,保存的史料不是太多,我们只能大致描述。

巴拉第于1817年9月16日出生在喀山州契斯托波尔斯克县斯塔洛舍施明斯克镇郊一个大司祭家庭〔3〕。祖父是神父,父亲格利戈利耶维奇(Кафаров И. Г.)毕业于喀山神学院,后来到斯塔洛舍施明斯克的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做神父〔4〕。1806年,他又被委任为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的监督司祭;1807年,又升为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大司祭,管理两个古老的乡村教堂〔5〕。他很有才干,无论是辖区内民族信仰的分离问题〔6〕,还是复杂的教会财务管理问题〔7〕,他都应付自如。至于巴拉第的母亲伊万诺夫娜(Ивановна М.),最令他们兄妹终生感谢。她忙碌一生,除了辅助丈夫,承担所有家务外,全部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们身上。她育有9个孩子。巴拉第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8〕、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们可以想象,要把这么多儿女养育成人,对她

〔1〕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г. часть I. С. 3.

〔2〕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М. 1990г. С. 90.

〔3〕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54,案卷2(1817年)“契斯托波尔市及契斯托波尔斯基县的婚丧登记册”。转引自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г. часть I.

〔4〕 同上注,目录62,案卷4(1825年),第9页;全宗7,目录66,案卷3(1829年),第11页。

〔5〕 同上注,目录64,案卷3(1827年),第9页。

〔6〕 同上注,目录66,案卷3,第9页。

〔7〕 同上注,目录66,案卷3(1829年),第1页。

〔8〕 同上注,目录54,案卷3(1817年),№32,第1005页。

来说是多么艰难。由于这位贤良勤劳的伟大母亲的教育,以至于巴拉第刚满8岁,就开始写作和阅读^[1]。优良的家教,为以后这位汉学巨头的杰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神学世家,巴拉第兄弟都受到了严格的神学教育。大哥亚历山大从喀山宗教学校毕业后,1855年就接替父亲,做了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的监督司祭^[2]。二哥尼古拉于1836年由喀山宗教学校毕业后,任契斯托波尔斯克县色捷林斯基洛镇的神父^[3]。而他的一个叫伊丽娅的姐姐,也嫁给了一个神父^[4]。这种严格的很有特色的神学世家的特殊生活环境,对巴拉第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决定作用。

与其兄长们一样,巴拉第于1827年进入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神学学校接受启蒙教育^[5]。他学习非常努力,成绩很好。1831~1832年进行年终总结时,在表格的“能力、勤勉与成绩”栏里写着“优秀”,而在“品德”栏里写着“非常诚实”^[6]。

1832年,15岁的巴拉第从神学学校毕业,旋即进入喀山宗教学校^[7]。在那里,他以自己的万分勤勉及温和性格赢得了老师的注意。在低年级进修班学生的记录本上,巴拉第的姓名旁边写着:“5月份非常安静、温和、勤勉”,“1833年10月份的学习中,长期品德优良,温和,努力”^[8]。

就学习成绩来说,巴拉第对哲学和语言学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以下是哲学主考官给他的成绩:1834年12月、1835年6月“很好”;1835年12月“非常好”;1836年6月“优秀”。而古代欧洲语,古希腊

[1]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2,案卷4(1825年),第9页。

[2] 同上注,全宗4,目录62,案卷2(1830年),第17页;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I-5,1823年,目录34,案卷II,第一部分,第215页,第324页。

[3] 同上注,目录68,案卷126,№24(1836年12月13日);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I-5,1840年,目录34,案卷II,第一部分,第215页。

[4] 同上注,全宗7,目录66,案卷3(1829年),第16页。

[5] 同上注,目录64,案卷3(1827年),第9页。

[6] 同上注,案卷120(1827年),第358~359页。

[7] 同上注,案卷127,第51页。

[8] 同上注,案卷143,第86页。

语和古法语等外语考试都是高分。法语老师3次考试都给了他“很好”——仅仅1次(1834年12月)是“好”。与外语及其他人文学科科目相比,他的数学成绩显然弱些:1834年12月得的是“好”,1835年6月得的是“差”,1835年12月得的是“中等”,1836年6月得的是“好”〔1〕。

尽管是宗教学校,但相当重视历史教学。早在1832年,巴拉第在宗教学校低年级学习时,就已经学完了历史教程。这个教程有一个简短的序言,阐述了“历史概念”、“历史对上帝意识、对敬仰上帝、对人的意识的好处和乐趣”、“有关希腊历史的章节与计划:希腊人的起源、希腊德弗卡里昂的产生”、“费弗斯基王朝的基础”等问题〔2〕。

宗教学校不但开设了一般历史课程,而且还开设了有关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及其与亚洲邻邦关系的课程。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师大都为有能力的教师,巴拉第等许多同学听了这些课程后激动不已。这些老师包括为比丘林所熟知的兹伯耶夫〔3〕(Сбоев В. А.)和韦氏涅夫斯基(Вишневский В. П.)等。1847年11月,比丘林曾把自己刚出版的书《中国的道德与公民状况》送给韦氏涅夫斯基〔4〕。请注意,这条史料对我们研究巴拉第以后申请去中国的动机很有启发。这些老师与比丘林密切的学术关系,势必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1837年,巴拉第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深造〔5〕。1838年,巴拉第顺

〔1〕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6,案卷171,第52页。

〔2〕 同上注,案卷127,第1、9、16页。

〔3〕 俄罗斯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А-27-6-Н.Я.比丘林通讯录。

〔4〕 这本附有Н.Я.比丘林亲笔题词(1847年11月30日)的书,藏于俄罗斯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图书馆(莫斯科)。书中还盖有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主要档案馆的椭圆形印章。

〔5〕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01,第16页。

利毕业,被神学院管理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录用做文牍秘书^[1]。老实说,这等于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神学部门的升官之道。可出乎意料的是,办公室的工作很快使巴拉第厌烦了。不久他给正教事务衙门递交了请求书,居然要求把他列入将被派往北京的俄罗斯馆。1839年8月2日,他的请求被批准。当天,他就前往教堂受洗入教,教名“巴拉第”。从此他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巴拉第作出这样出乎意料的决定?

现任职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霍赫洛夫教授认为,“至于促使巴拉第走上这一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拮据的经济状况,还是失败的爱情,抑或是渴求通晓东方民族生活的知识呢,很难说”^[2]。确实是这样,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说,很难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巴拉第自己从没有在日记或信件中谈到过这类问题。就霍赫洛夫教授所列举的三点原因来说,至少第一点就靠不住。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其家庭很困难,或者作为神学院文牍秘书,其经济收入不敷支出。至于“失败的爱情”,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会太明显。因为19世纪一个俄罗斯人失败的爱情,很难说就导致他和遥远的中国发生什么关系。由巴拉第的私人信件可知,他曾经和旅居意大利的女艺术家苏哈沃-卡贝丽娜(Сухова-Кобылина С. В.)的妹妹有过一段失败的爱情。1860年后,巴拉第在罗马曾与苏哈沃-卡贝丽娜相遇:“在到罗马居住近四年之后,巴拉第认识和接近了许多杰出的俄罗斯知名艺术家,他们或在意大利学习绘画,或在那里进修自己的技艺。其中和天才风景画家苏哈沃-科贝丽娜的友谊最为密切。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人,由于私人生活上的不顺利致使她相当虔诚地信仰上帝。巴拉第非常密切地关注她的事情,总在她艰难的时刻帮助她。尽管他曾与她的一个姐妹恋爱无望,但他仍然把她日常生活的不顺和失算,当

[1]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私人档案总汇和庶务档案,目录464/3,案卷823,第1~4页。

[2]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г. часть I. С. 11.

成自己的私事来承担。”^{〔1〕}1865年7月31日,巴拉第在一封给苏哈沃-卡贝丽娜的信中说:“很久以前,您,善良的瓦西里耶夫娜,曾经因我不可原谅的沉默而谴责过我……我知道,您的生活道路走得很不顺,似乎难以改变……没有和您的姐妹在一块么,对她,我是绝对有愧的。请她原谅我,此前我没有给他亲笔写过什么,我很愧疚。”^{〔2〕}但巴拉第这段爱情为何失败,以及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仍然无法知晓。至于“渴求通晓东方民族生活的知识”,客观上确实存在^{〔3〕}。这点我们可以从巴拉第的好朋友戈爾斯基(Горский В. В., 1819 ~ 1847)给其父母所写的信件中得到佐证:“我实话对你们说,吸引我到那里去的原因是对知识的渴望,在那里能发现最丰富、最取之不尽、最杰出的知识,而这在其他世界是不可能得到的。吸引我到那里去还有对成名的渴望,中国是获得名声的最佳途径。对其他人来说,到中国去是因为对利益的渴望,而对我来说,利益似乎并不诱人,如果为了这个我是不会到东方去的。”^{〔4〕}可见,这方面因素的影响很明显。但问题是每个人的感受有可能不同,我们不能拿戈爾斯基的感想来证明巴拉第的想法。而且这不过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面即世俗功利心也对这些向往东方的学子们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比丘林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堂执事的儿子,就因为去中国所以成了俄罗斯乃至世界闻名的学者,这感染并鼓舞了许多人。戈爾斯基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比丘林通过研究中国文学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他是伦敦和巴黎亚洲协会的名誉成员。”^{〔5〕}但是,从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巴拉第的生活态度来看,这种功利心不可能给他以去中国的动力。瓦西里耶夫曾在日记中写道:

〔1〕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 г. часть I. С. 69.

〔2〕 俄罗斯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全宗 223,第 20 盒,第 4 保存单元,第 10 ~ 11 页。

〔3〕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 г. часть I. С. 11.

〔4〕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97 г. №5. С. 232.

〔5〕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97 г. №5. С. 228 ~ 229.

“巴拉第神父和我相交多年,他连虚伪的影子都看不到。”^[1]1867年,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贝勒士奈德(E. Bretschneider, 1833 ~ 1901)写信给奥斯汀-萨克恩(Остен-Сакен Ф. Р.),曾这样谈及巴拉第:“我不打算啰嗦他作为一个人和学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欧洲人、中国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2]第十二届俄罗斯馆首脑图伽利诺夫(佟正笏,Тугаринов П.)也写道:“他安静,温柔,随和……在四年多的北京生活期间,我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一次和自己的同事们相处时哪怕是几分钟的不和睦,或者是做出任何有失分寸的事情。”^[3]很难想象,受到这样交口称赞且品德高尚的人会受到功利心的引诱。

不过,从巴拉第的学习和成长过程看,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或许坚定了他申请去遥远中国的决心。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说,他在喀山宗教学校学习时,不但该校专门设有关于俄罗斯和东方的关系的课程,而且该校的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和当时俄罗斯馆的一些成员如比丘林有密切的联系。这些课程的开设,为巴拉第作了有关东方知识的启蒙,而这些老师和北京俄罗斯馆的联系则引起了巴拉第对中国的向往。尤其是被委任为第十二届俄罗斯馆首脑的图伽利诺夫,他从北京回国后,于1838年1月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而当时巴拉第也正在那里学习和工作。如此一来,他自然就成了第十二届俄罗斯馆首脑的熟人和同事。这样,巴拉第就完全具有了申请去中国的人际关系和知识准备。后来,第十三届俄罗斯馆的大部分成员都来源于圣彼得堡神学院^[4];另一方面,就是长期宗教学校的规范保守的学习生活^[5],再加上神学院文牍秘书职位的枯燥,使巴拉第透不过气来。要摆脱这些,去遥远的中国,对当时的巴拉第来说,恐怕是为数不

[1] Скачков П. Е.. Академик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о П. И. Кафарове.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г. №IV. С. 208.

[2]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8. Мая 1868г. №1. С. 25.

[3] Записки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 Т. 22, №1. СПб. 1892г.

[4]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г. часть I. С. 11.

[5] Там же С. 9.